

# 谋升的历史故事

李盛 编著

辽宁少儿出版社

出版社：辽宁少儿出版社

署名：李盛/编著

书号：ISBN 7—3589—7583—6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5 年 3 月第 1 版

## 目 录

皇帝宝座不是目的，统治世界才算终极  
心劳日拙力不从心，功成名就退出政坛  
勿贪权位，多种功德  
富贵弄权，自取灭亡  
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淡泊明志，处名让名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富贵如云，宁静致远  
清心寡欲，激流勇退  
攀龙无门巧附凤，移花接木迂回胜  
靠女儿富贵，因争权丧命  
妹掌权兄沾光，女为后子称王  
攀龙得高升，至弗受宠信  
自称儿皇帝，借力图中原  
刘知己远趁乱称帝，群属下酷杀贪财  
摄政王终得美人，顺治帝始固皇位  
借儿女婚姻，施政治权谋  
遇难不犯愁，有女能救急  
窦家有女初长成，深宫奇后振家风  
助主成大业，嫁女防失权  
赖姻亲独霸政坛，靠蒙骗树立声威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不倒翁”从文发迹，徐世昌攀龙附凤  
奉上美女再作儿，讨得欢心自迁升  
没有靠山急死人，认个爷爷好升官  
英雄爱美人，政治要靠山  
娶贵妇发财，攀希魔升官  
用美女谋官位  
把领导夫人攥在手里

---

---

## 皇帝宝座不是目的 统治世界才算终极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权力对于拿破仑来说，犹如乐器对于伟大的演员一样。确实，一旦大权在握的拿破仑，对于权力的运用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的。他说：“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雾月政变后，他从督政府那里接收过来的遗产并不令人羡慕：强邻压境，港口被封锁，盗贼蜂起，百业凋零，财政空虚——国库中真正的金属货币仅一千二百法郎！面对这样一个破烂摊子，拿破仑声称：革命的浪漫史已经结束，现在需要的是实行那些实际的和切实可行的原则。于是，他根据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领域，忽而扮演狮子，忽而扮演狐狸，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下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他的国内措施。

首先，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取消一切地方自治机构。拿破仑把全国划分为八十八个省，省长由他直接任命，市镇长官由省长任命，地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各级议会徒有虚名。司法人员也由他和元老院任命，陪审制度被取消。他还设置了警务部以及直接对他负责的巴黎警察总署。拿破仑常说：“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正确”，所以对军队，他一直狠抓不放：强调铁的纪律，保证粮饷供应，每周检阅团队，亲自监督士兵操练，并培植了一支对他无限忠诚的近卫军。他也深知舆论工具的重要，他说：

“三家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为了管制刊物，必需鞭子和棍子”。巴黎七十三种报纸被封闭了六十九种，幸存的四种则在警务部长的严格监督下，成了极其驯服的御用喉舌。

拿破仑对行动迟缓、无所作为和文牍主义深恶痛绝，他说：“‘不可能’这个词，只有在庸人的词典中才会有！”他以身作则，好学不倦，强记博闻，亲理万机，每天工作十几个乃至二十个小时。他的下级认为拿破仑比部长们管得还要细致，比如，他能具体揭露在边界建设公路的包工头是如何欺骗政府的；他能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详细分析里昂丝绒价格涨落的原因；他甚至还了解巴黎歌剧院的演员们为什么勾心斗角。拿破仑确实天赋过人，精力充沛，但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天才，他说：“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这完全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的突然启示，而是我的思考对我的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与此同时，拿破仑淘汰冗员，选拔人才，改革税收制度，整顿财政机构，加强监督，严惩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分子。他还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宣称“不要让人活到老，这是统治的极大的艺术”，要求部属也跟他一样拼命地工作。一位官员后来承认：在拿破仑的鞭策下，“我们大家都习惯于想干大事

了”。总之，在法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拿破仑以军事独裁的形式，建立了一个保证统一意志的、高效能的政府，缔造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厦。

其次，他倾力对付雅各宾派和王党分子，加强对工人、农民的统治。保证国内的统一、稳定和秩序，维护大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是拿破仑的根本任务。一方面，他决不容许波旁王朝卷土重来。雾月政变后，流亡在外的普罗旺斯伯爵曾两次写信给拿破仑，答应他如能帮助波旁复辟，则可“获得任何奖赏”，还将保证他的后代“得到幸福”。拿破仑答复道：“阁下必须放弃返回法国的任何希望，否则将要付出十万死尸的代价！”他多次派兵清剿叛党和土匪，对那些死心塌地的王党分子予以无情镇压；同时，他又下令：只要放下武器，宣誓效忠新制度，即可得到赦免。这软硬兼施的两手确实颇见成效：以旺代省为大本营的王党公开叛乱基本被平息了；数以万计的流亡者也陆续返回了法国。另一方面，拿破仑更是决不容许人民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并把在这方面鼓吹最力的雅各宾派视作心腹之患。他严禁工人罢工、组织工会，并规定工人必须持有“身份证”，否则视同流浪者，可以治罪。他还严令书刊、戏剧、学校绝对禁止回顾革命的往事、谈论革命时期的人物，甚至连反对革命的报纸也禁止进口，因为它上面印有“革命”这两个字。总之，他要抹去会使人们想起革命高涨时期那些美好原则和理想的一切痕迹。他也急于否认自己曾写过拥护雅各宾派的文章，并出了一大笔钱，让当年替他出版《博盖尔晚餐》的书商的遗孀把尚存的小册子全部销毁。更重要的是，拿破仑从不放过一个机会，多次掀起了迫害雅各宾派的风潮。例如：180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他乘车去巴黎歌剧院的路上，一枚定时炸弹爆炸了，拿破仑幸免于难。第二天，他就一口咬定“这是一帮九月分子干的！”随即下令逮捕了一百三十名著名的雅各宾派分子，并把他们流放到了万里之外的中美洲。事后查明，此事系保皇党一手策划，同雅各宾派毫不相干。可是拿破仑不仅拒绝给予平反，反而恶狠狠地说道：“算啦！现在我总算摆脱他们了！”当然，对真正的凶手，他也决不留情：几十名王党分子被逮捕，为首的两人被斩首。就这样，拿破仑利用这起未遂的暗杀事件，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他在晚年曾说过：“我是两个不同的人：有头脑的人和有良心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象别人那样多情善感的心，但是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平静下来，以致它现在不发出一点声响。”确实，在需要对付自己的政敌时，拿破仑的这条心弦从来是寂然无声的。正是这种铁的手腕，这种不受任何“道德”和“良心”约束的冷酷无情，使他出色地完成了大资产阶级所赋予的“佩剑人”的使命。

重建国内秩序的另一项重要保证，是控制天主教会。拿破仑本人基本上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深知不能忽视当时多数法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绪，他也非常清楚作为“精神警察”的宗教对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1801年4月，他在给吕西安的一封信

信中说得十分露骨：“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拿破仑在同罗马教皇谈判后，于1801年7月签订了《教务专约》：政府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废除革命时期限制举行宗教仪式的法令，教士的薪俸由国家支付。作为交换条件，教会必须永远放弃在法国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和其它财产，承认这些教产的买主是合法的所有者；主教和大主教不再由教皇而是由拿破仑任命，主教任命的神甫也必须由政府批准；各级教士必须宣誓遵守共和国宪法。这项著名的条约，曾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为“英明的杰作”，因为它使教会放弃了对土地和什一税的要求，保障了自耕农、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人心，分化了王党。从此，影响巨大的法国天主教会被置于拿破仑的铁腕之下，成了大资产阶级军事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

拿破仑极为重视发展生产和科学。他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从小就受过科学教育的统治者；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证明有必要采用机器，就如同证明太阳比蜡烛照得更亮一样。”而且，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也必然要关心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要为他们争夺欧洲的经济霸权尽心竭力。所以他一上台，就采取了国家订货、保护关税、提供巨额津贴、实行发明专利、举办博览会等办法，扶植和振兴民族经济。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法国于1800年创立了法兰西银行，1801年成立了“奖励民族工业协会”，1810年又建立“工厂和工场管理委员会”，1811年设立工商部，并制订了《商务法典》。在农业方面，他采取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谷物售价、保护森林、推广良种、培植新作物等措施。

更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的数学迷拿破仑，终其一生，对自然科学的有着特殊的偏爱。早在布里埃纳军校读书时，他就已懂得：要赢得战争，科学家比神学家的用处更大。远征东方时，他带了一大批学者，建立了埃及科学院，自任副院长(院长是他的老师蒙日)；也正是在埃及的行军路上，他发布了“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的著名命令，这说明他当时最关心的除了驴子驮运的辎重外，就是科学家的安全了。1804年，拿破仑亲自授予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1814年，当反法同盟大军兵临巴黎城下的危急时刻，理工学校的学生要求入伍，参加保卫首都的战斗。拿破仑踌躇再三，最后毅然说道：“我不愿为取金蛋而杀掉我的母鸡。”这句名言，后来被刻在该校物理系梯形大教室的天花板中央。正是在这位具有科学头脑的独裁者的统治时期，法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蒸汽机得到了推广，“珍妮”纺织机从1790年的九百架增加到1805年的一万二千五百架。国民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煤产量从1789年的二十五万吨增至1812年的八十万吨，生铁产量从1790年的四万吨增至1814年的十一万吨。

然而，在内政方面，拿破仑自己最得意的杰作，还是《拿破仑法典》的制定。1800年8月，他组织班子，开始起草民法典。草案拟出后，参议院开了一百零二次会议进行讨论，拿破仑亲自主持了其中的五十七次。会上，他经常十分内行地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使与会的法学家们大为叹服。1804年3月，包括二千二百八十一项条文的《法国民法典》正式公布了。法典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它确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确认资产阶级“权利平等”的原则，保证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和契约自由，并宣布逃亡投靠外国的王党分子不受法律保护。同时，法典也规定了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子、雇主对工人的绝对权威。总之，民法典是拿破仑治国的根本大法，它保证了新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原则不被任何进攻所削

弱，不管这种进攻是来自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主，还是想砸碎自身枷锁的无产者。这部法典，后来也随着法国军队的向外扩张，在许多国家实行过，对动摇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促进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拿破仑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回忆道：“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恩格斯在指出民法典的某些方面比起雅各宾派的激进原则有所倒退的同时，也对它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因为它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为法律的唯一现代民法典”。

军事独裁适应了当时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需要，也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勃勃野心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他声称：“我的原则是：法国第一”，“决不允许让一个天生要成为太阳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卫星。”他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极限”，“只向往一个世界帝国，世界要求我来统治它”。而欧洲列强则始终把拿破仑看作是法国革命的代表，是对封建统治秩序和欧洲均势的威胁。所以自他称帝直至被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十年间，欧洲大陆狼烟四起，烽火不绝。

1805年夏，拿破仑已在布伦港集中了两千多艘船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海军上将维尔纳夫将率领土伦舰队从地中海赶来会合。8月3日，皇帝亲临布伦，检阅了队列长达九英里的部队。一连好几天，他不是沿着海滩策马奔驰，就是在危岩峭壁间来回踱步，焦急地极目西望，一心想看到天边出现维尔纳夫的舰队。可是，8月27日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土伦舰队被英国海军堵截，龟缩于西班牙加的斯港，无法如期到达。拿破仑闻讯，气得直咬牙：“好一支海军！好一个海军将领！一切牺牲都白费啦！我的希望完蛋了！”

这时，欧洲大陆的形势更为不妙。早在1801年3月，沙皇保罗一世即已被刺，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叫嚷要“把欧洲从拿破仑的暴政下解放出来！”1804年夏，法、俄断交。接着，俄奥、俄瑞(瑞典)、俄英先后签订反法密约，计划动员五十万军队，

英国答应给每十万名士兵每年提供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补助金。1805年8月，奥地利也加入了同盟。这样，第三次反法同盟正式形成，联军迅即向法国推进。

风云突变。拿破仑断然决定放弃准备了两年的入侵英国的计划，火速率领布伦大军挥戈东向，不到二十天，就从英吉利海峡赶到了多瑙河。他一面派出一个军团往东南堵截俄军，一面又率主力突破敌人的多瑙河防线，把奥军主力团团围困在乌尔姆要塞。10月20日，身陷绝境的奥军不战而降。

拿破仑历来主张“军队的力量就象力学中运动的数量一样，等于人数乘速度”。在这场争时间抢地利的比赛中，他赢得了第一分。法军欢欣鼓舞，连日来在炎日风沙和大雨泥泞中急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他们说：“皇上发明了打仗的新办法——不是用刺刀，而是用咱们的两条腿来作战。”接着，拿破仑又乘胜前进，于11月13日占领了维也纳。弗兰西斯皇帝出奔奥尔莫乌茨。

正当哈布斯堡王朝岌岌可危之际，亚历山大一世匆忙赶往柏林，敦促普鲁士加入了反法同盟；然后，他又直奔奥尔莫乌茨，同奥皇会合。其时，七万三千名法军的正面有俄军七万五千、奥军一万五千，如果还要应付即将从侧面扑来的十多万普军，后果则不堪设想。拿破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抢在普鲁士正式参战之前，诱使俄、奥决战。于是，他派侍从武官长去见沙皇，低声下气地请求化干戈为玉帛；自己也在俄国特使面前，扮出一副愁眉苦脸，忧伤不安的样子。亚历山大狂喜地认为自己的对手已打得精疲力尽、害怕了；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打！就这样，年少气盛的亚历山大乖乖地钻进了拿破仑布下的圈套。

1805年12月2日清晨，法军同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村附近展开会战。拿破仑预料敌人会企图截断法军去维也纳的退路，便将计就计，故意调开左翼，把俄军引入包围圈，再以占领普拉琴高地的主力猛攻其侧背，将敌人逼下冰封雪冻的特尔尼茨湖，然后用大炮轰击。联军大溃，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淹死，总司令库图佐夫也受了伤，险些被俘。傍晚，战斗结束，法军只损失九千人，而联军却死亡一万五千，被俘近两万，其余皆作鸟兽散。至于那两位皇帝，早在全军覆没前不久就逃之夭夭了；几个小时还还骄横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一路上浑身发抖，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禁抱头痛哭。

奥斯特里茨战役一举摧垮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它是拿破仑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自己也说：“这一仗打得实在最好。同样的仗我曾打过三十次，但是没有一次比得上这一次。”

俄、奥的惨败，使得反法同盟的积极组织者、英国首相皮特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临终前，他要人取下墙上的欧洲地图：“卷起来吧！今后十年不需要它了。”

皮特这个悲伤的预言的确没有说错；拿破仑毫不留情、随心所欲地开始重新绘制欧洲地图了。早在1805年上半年，他就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改为意大利王国，自任国王；还把利古里亚共和国并入了帝国版图。奥斯特里茨战役后，他又占领了那不勒斯王

国，任命长兄约瑟夫为国王；把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任命二弟路易为国王。接着，巴伐利亚等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十五个小邦，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组成了莱茵邦联，并“选举”拿破仑皇帝为自己的“保护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存在了近一千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从此寿终正寝。

对拿破仑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欧洲列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在俄、英的策划下，第四次反法同盟很快就于1806年秋建立。这次充当急先锋的是尚未同拿破仑直接交过手的普鲁士，上至宫廷显贵、下至各级军官都大言不惭地扬言要给“科西嘉暴发户”、“卑贱的小鬼”一个狠狠的教训。可是，10月14日，拿破仑和达乌元帅分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次会战中，给予普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两个星期后即直捣柏林。普王威廉三世带着他的小朝廷狼狈地逃往东部边境。正如德国大诗人海涅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拿破仑呵一口气，就吹掉了普鲁士。”

接着，拿破仑又先后经过艾劳和弗里德兰两次战役，打垮俄军，迫使俄、普于1807年7月分别与法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俄国答应结束同英国的合作，承认法国在欧洲所造成的一切领土和政治上的变动，并与拿破仑达成肮脏的默契：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至于那个狂妄的普鲁士，则要惨得多了。它丧失了几近一半的领土和人口，还要付出一亿法郎的巨额赔款。拿破仑在这些被割让的地区，建立了附属于他的华沙大公国以及由幼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第四次反法同盟土崩瓦解。苛刻异常的《提尔西特和约》，使拿破仑贪得无厌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而普鲁士的惨败，则充分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在人民的压力下，普王威廉三世不得不起用一些有识之士，在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些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

1809年初，新的反法同盟又拼凑起来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惨败的奥地利，此时已渐渐恢复元气。它在俄国的怂恿下，再度与英国结盟，乘拿破仑亲征西班牙的机会，集结了四十万大军，侵入巴伐利亚。拿破仑匆忙赶回，经过多次激战，再次占领维也纳，并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彻底击溃奥军。10月14日，法、奥签订《维也纳和约》，奥地利被迫割让大片土地，赔款八千五百万法郎。第五次反法同盟遂告烟消云散。

从土伦之战开始，十六年来，拿破仑身经百战，几乎是所向披靡。怎样来解释这一连串令人似乎不可思议的胜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迄今为止，他的对手几乎都是落后、腐朽、等级森严、士气低落的封建军队；而当时的法国则代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拿破仑本人、他的一整套新的战略战术以及他的官兵，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当然，除了这条根本原因外，拿破仑本人的作用也是不容抹煞的。中国古代兵书《六韬》曾指出：“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溃败)”。无疑，拿破仑具备了“仁”、“勇”、“智”、“明”这样的主观条件。

拿破仑特别重视争取和鼓舞军心。尽管他心底里把士兵视作

“炮灰”，但极少把这种想法流露出来。他总是成功地使自己的部下确信，他和他们都象过去一样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波旁王室和干涉者的侵犯，他——波拿巴将军或拿破仑皇帝，只是法国的第一名士兵。他经常穿着朴素的灰大衣同士兵们在一起，亲切地揪他们的耳朵，耐心地听他们发牢骚。他甚至能叫出许多士兵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性格、经历和家庭。奥斯特里茨战役阵亡将士的遗孤，他都视如己出，抚养成成人。他尊重士兵的人格，严禁体罚，更重视以荣誉和奖赏来激励部下。他常说：“谁不想当元帅，谁就不是个好士兵！”他也确实说到做到，只要谁卓有才干，不问出身、年龄，就能得到提拔。拿破仑的这种作风，同封建军队中官兵之间的主奴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他的运筹帷幄、百战不殆，所以赢得了广大战士的无比信赖和狂热崇拜。他的死对头、英国的威灵顿将军为此感叹说：“拿破仑一上战场，能抵四万大军。”

拿破仑也深知统帅身先士卒的重要。他并不主张总司令轻率地去作无谓的牺牲；但一旦情势需要，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亲冒矢石，为部下作出榜样。他说过：“死算得了什么！生于战败中，生于耻辱中，还不如一日百死！”洛迪和阿尔科拉战役中，他跳下战马，亲自高举军旗，冲在最前面。艾劳战役中，他在俄军的猛烈炮火下，接连几个小时屹然挺立，沉着冷静地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尽管在他的脚下倒下了一具又一具尸体。艾克缪尔战役中，他脚部负伤，却严禁副官声张，坚持指挥到底；战斗结束后，他还强忍疼痛，微笑着向欢呼的士兵们频频招手。在叙利亚的败退路上，他严守自己下达的命令，与士兵一起步行返回埃及。在艾劳战役后驻军波兰的那个严寒饥饿的冬天，他没有住进奢华的华沙宫，而是同士兵一起，生活在“雪和污秽之中”，没有面包，没有酒，接连十五个昼夜没有脱过一次鞋。

拿破仑具有远大的战略目光，掌握巧妙的作战艺术。他努力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和速度”。他的作战特点是：第一，实施广泛的机动，利用山川掩护大军行动。或夺占战略高地，以便重炮轰击；或选择步、骑、炮兵能充分展开的有利地形为决战场所。第二，在决定性方向上，迅速集结优势兵力，采取突然行动；如遇上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则竭力将其分割成小块，然后各个击破。他用一句话概括了上述的战略思想——全部军事艺术在于：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地方，集中比敌人在此时此地更大的兵力。

正由于拿破仑充分利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强大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力量，充分发挥了自己震古烁今的军事天才，所以这支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法国军队，被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所鼓舞，被荣誉和升迁的希望所激励，十多年来纵横驰骋，无敌于欧洲。

当然，随着帝国的建立，在拿破仑对外战争的侵略性、掠夺

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支传播过法国革命原则的军队也越来越堕落为民族沙文主义的工具。当拿破仑贪得无厌地压榨和奴役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時候，当欧洲人民奋然觉醒、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烽火的时候，当他的敌人也学习了他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组编自己军队的时候，法国军队质量上的优势也就逐渐丧失了。拿破仑个人纵有天大的魅力和本领，也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

只说在 1809 年那会儿，拿破仑皇帝确实是意满志得，无往小利的。不过，他也有桩放不下的心事，那就是约瑟芬始终不曾为他生下一男半女。世袭无人，使拿破仑焦灼不安。《维也纳和约》签订后不久，他终于向皇后提出离婚。约瑟芬当场就昏迷不省人事，拿破仑心里也不好受。但他还是勉力劝慰：“我永远爱你。不过，政治是不讲感情，只讲理智的。”约瑟芬明白，眼泪和昏厥都无法使皇帝回心转意，只得悲痛地表示，为了法国的利益，她同意离婚。

紧接着，拿破仑就向沙皇的妹妹求婚，但彼得堡彬彬有礼地以公主年龄太小(十六岁)为由予以婉言谢绝。于是，拿破仑又向维也纳提亲。新败不久、创巨痛深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了赢得喘息时机，便一口答应了。1810 年 4 月 2 日，拿破仑同十八岁的奥地利公主路易丝在巴黎成婚。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嫡系、欧洲大陆上的一等世家，同它联姻，极大地满足了拿破仑的虚荣心。第二年 3 月，新皇后生下一子。拿破仑更是心花怒放，下令按照波旁王太子诞生的惯例，鸣礼炮一百零一响，并立即授予这个婴儿以“罗马王”的称号。从此，他可做子孙帝王万世的美梦了。

拿破仑具有这种无法用“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或“反动性”来解释的封建意识，并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的主要措施也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阶级烙印却是不会轻易磨灭的。随着他的称孤道寡，在他的血管里科西嘉贵族的血液又重新沸腾起来。他承认自己“对名门世族”有着“显而易见的偏爱”。而娶奥国公主为妻，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从而为自己的宫廷和家谱装点门面，正是这种“偏爱”的登峰造极。他声称自己要“成为旧和新之间联盟的拱门，成为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天然中间人”，实际上正是为封建因素在法国的复辟敞开了大门。

早在 1808 年，拿破仑便建立了爵位和封土都是世袭的“帝国贵族”制度。他一共制造了几十个亲王和公爵，几百、上千个侯爵、伯爵和子爵。在帝国贵族中，旧贵族出身的占 22.5%，资产阶级出身的占 58%。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以恩威并用的两手，放宽了对旧贵族势力的高压政策，有意识地缓和同他们的矛盾，这在当时对稳定国内秩序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然而，后来他在这方面却走得越来越远了。流亡归国的旧贵族得到十分优厚的待遇。在帝国时期，这些老吸血鬼已收回了过去被没收、征用、出售的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到 1814 年，拿破仑所任命

的省长中，旧贵族竟占了43%。至于那些新贵族，更是锦衣玉食，脑满肠肥，他们是靠血腥战争起家的暴发户，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法郎。这个新旧贵族的联盟构成了拿破仑帝国的重要社会支柱。

随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等级制的建立，一整套繁缛的宫廷礼仪和豪华排场也应运而生了。拿破仑委派专人，仿效波旁王朝的旧制，制订了长达八百页的朝仪规章。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三色帽徽和“公民”的称谓早已被废弃。时髦的绅士们又穿起了革命前贵族的长丝袜和带扣子的鞋，风雅的女士们也重新穿上紧身胸衣和袒胸露肩的连衣裙。宫廷里盛行的是穷极奢华、比波旁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各种典礼和舞会。总之，拿破仑迷信王室正统，极力要人们忘记他只是个卑微的“篡位者”，力图使欧洲的帝王们承认他是“自己人”，并要在他们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

确实，他似乎已做到了这一点。1810年，拿破仑正如日中天，光芒夺目，炎威逼人，权倾四海。他既是法国的皇帝，又是意大利的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的仲裁人，荷兰、那不勒斯王国、华沙大公国以及其他附庸国的太上皇。在国内，反对派几乎鸦雀无声；在国外，整个中欧和西欧都匍伏在他的脚下。在巴黎市中心，矗立着巨大的旺多姆圆柱，这是用对外战争缴获的大炮铸成的，上面是头戴桂冠，手持权杖、金球的拿破仑铜像。他的御用报纸谄媚地声称：“假如昔日的废墟上，不是出现了一位举世肃然起敬的、若天命之所归的人物，欧洲文明恐怕已经绝灭。”是啊，拿破仑已不再是人，而是高耸云端、超凡入圣的“救世主”了。

## 心劳日拙力不从心 功成名就退出政坛

维也纳会议以后，梅特涅已成为欧洲各国君主指靠的主要人物。他的对外政策的重心是与各国封建王朝通力合作，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

梅特涅认为，解除对法国的约束，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统治，使法国重新扮演大国角色，是确保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封建秩序的关键。1818年，法国波旁王朝要求联盟诸国讨论提前撤军的问题。梅特涅根据“四国同盟”关于定期举行会议的有关条款，立即与英、俄、普三国磋商，决定召开有法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商讨有关法国和联盟内部关系等问题。他选择了原神圣罗马帝国的故都——亚琛作为会议地点。9月20日，梅特涅主持的亚琛会议开幕。亚历山大一世、卜斯尔雷、哈登堡及法国新首相黎塞留都兴致勃勃地到会。在讨论法国问题时，俄、英、奥、普的代表一致认为，法国已恢复了募兵制，保持4万兵员，就足以维持波旁王朝的统治了。10月9日，联盟诸国的军队撤离法国；赔款数减为2.65亿法郎；接纳法国参加“四国同盟”，成为“五国同盟”。而且，“俄、英、奥、普于11月初续订了四国联盟

协定，共同承担以武力维持波旁王朝统治的义务，反革命势力进一步扩大并联合了起来。梅特涅把亚琛会议看成是他的均势外交的辉煌成果，狂言维也纳会议上自己提出的欧洲“持久和平”体系已确立，欧洲“犹如耶稣基督去释放罪人一般”的现状不再会有变化，吹嘘自己受到人们欢呼。然而，欧洲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些话，不过是痴人说梦。

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各邦国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在梅特涅的支持下，各邦国统治者严酷镇压一切自由主义运动，禁止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强烈不满，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不断高涨。1817年10月17日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300周年纪念日，耶拿大学的教授、学生举行集会，公开谴责梅特涅的专制政策，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实现德国的统一。梅特涅凶相毕露，叫嚷民主政治如果得势，德意志民族就会毁灭。他亲自拟定了镇压学生运动和进步人士的计划，组织委员会对大学生进行调查，设立法庭对那些被指控为阴谋反对邦联的人进行审判。1819年8月——9月，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矿泉，梅特涅主持召开了有各主要邦国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解散各大学学生会；解聘推崇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加强书刊出版检查制度；设立中央调查委员会，监视各地的革命活动。会议还决定，如果各邦君主制度受到威胁，邦联有权派军队进行“保卫”。

梅特涅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很不得人心。1819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交易会上，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符登堡等邦的70多名工厂主和商人联合向德意志邦联议会递交一次请愿书，要求邦联议会采取抵制英国商品倾销的措施，敦促尽早废除国内的层层关税。接着，“德意志商人和工厂主协会”成立，这个组织倡导建立关税区，主张振兴民族工业。梅特涅却认为，上述活动带有“煽动性和革命性”，禁止协会在奥地利境内活动；他阻止奥地利与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径，引起工商企业界的愤慨。

1820年3月，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鼓舞了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中的革命者，他们起来反对斐迪南一世(1751—1825)的残暴统治，国王被迫让步，颁布了自由主义宪法。梅特涅担心意大利这个最大的邦里的革命可能引起伦巴第、威尼斯的反奥行动，他要求英、俄、普、法会商对策。10月20日，俄、奥、普、英、法召开了特洛波会议。俄、奥、普的君主都亲自率领大臣赴会，英、法政府派了外交使节参加会议。梅特涅为了寻求沙皇俄国的支持，对亚历山大一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热，并把奥地利搜集的欧洲各地酝酿革命的情报送给了这位志同道合的沙皇。恰在此时，沙皇直接控制的近卫军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军团举行起义，这使亚历山大一世更加仇视革命，决心与梅特涅合作。他们操纵会议，通过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不管欧洲哪个国家爆发革命，缔约国都有权进行干涉和武力镇压。会议还授权奥地利在意大利采取军事行动，恢复斐迪南一世的统治。

在那不勒斯革命的影响下，巴勒莫(位于西西里岛北岸)人民起来要求独立，皮蒙特爆发了起义，奥属伦巴第、威尼斯也出现革命迹象。梅特涅深感问题严重，提议俄、奥、普、英、法五国一起同意大利各邦君主谈判，以阻止反奥情绪的蔓延。1821年1月21日，俄、奥君主、普鲁士王太子以及英国的代表又在莱巴赫举行会议，受邀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与意大利其他各邦君主参加。会上决定由奥地利来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梅特涅命令一支有1.6万名士卒的奥地利军队开赴那不勒斯，革命被镇压了下去，斐迪南一世的王位也恢复了。不久，梅特涅又命令8万奥军侵入皮蒙特，并指令奥军对革命者不要心慈手软。双方在诺瓦腊进行了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皮蒙特起义被镇压下去，意大利革命走向低潮。为了表彰梅特涅的“丰功伟绩”，奥皇于5月底，提升他为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宫廷及国务大臣。

亚平宁半岛上的革命风暴刚趋向平静，西班牙又燃起了革命火焰。这引起了欧洲列强的焦虑。梅特涅坚决主张武装干涉西班牙。1822年7月，他经过与俄、普等国政府协商决定，训令各自驻马德里的外交代表向激进派政府施加压力，声称欧洲所有君主国都关心西班牙国王及王室的安全。这一行动助长了西班牙反动势力的气焰。国王的近卫军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以推翻革命政权；人民奋起抗击；反动势力的阴谋未能得逞。欧洲各国宫廷惊慌失措，梅特涅也惴惴不安。他决定召集诸国开会，讨论武装干涉西班牙的问题。10月中旬，俄、奥、普、法、英五国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英国为保持欧洲仲裁者的地位，并独霸西班牙的国外市场，主张对西班牙革命采取不干涉政策。英国代表威灵顿在会议上明确表示，英国将不参与干涉西班牙局势的活动。法国因害怕西班牙革命会激起法国革命运动的高涨，愿意单独过问西班牙问题。俄国为插手西欧事务，蠢蠢欲动。诡诈的梅特涅不赞成俄国出兵西班牙，因为俄国如果成功，沙皇就成了欧洲头号霸王。因此，梅特涅约同普鲁士代表一起劝阻亚历山大一世。会议最后通过议定书，决定由法国单独出兵西班牙。1823年1月中旬，梅特涅指令奥地利驻西班牙大使回国，俄、普、法驻西班牙大使也跟着这样做。接着，法国宣布，10万法军将开赴西班牙。4月，法国干涉军进入西班牙。9月，西班牙革命被镇压下去。

意大利和西班牙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梅特涅更加得意忘形；此后，他把欧洲任何地方发生的革命，都看成是对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秩序的破坏，而牵头插手干涉。

1821年7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俄国为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削弱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借口希腊人和俄国人都信仰东正教，准备进军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梅特涅担心希腊革命会引起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导致欧洲革命；他还担心希腊投入俄国怀抱，引起东南欧均衡力量的破坏，奥地利将陷于俄国的包围中。因此，他极力主张镇压希腊起义，但英、俄两国反对。当时，列强因忙于干涉意大利、西班牙革命，希腊问题暂时被搁置了下

来。1826年，英、俄签订了议定书，同意希腊为半独立的土耳其属国。梅特涅对此事十分恼怒，指责沙皇践踏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咒骂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是破坏欧洲均衡秩序的祸首。1827年7月，英、俄、法在伦敦缔结了《伦敦协定》，规定：英、俄、法要求土耳其正式承认希腊为半独立国家，希腊每年向土耳其交纳一定的贡赋。这个协定是对梅特涅的沉重打击，它表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坎宁打败了封建君主的仆臣梅特涅。连梅特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坎宁在空中翱翔，我却在地上步行”；“坎宁的光芒犹如闪电一般，但是转瞬即逝；而我则并不光彩夺目，却在别人消逝之后仍能保持余辉”，但这只是梅特涅在安慰自己罢了。

《伦敦协定》使俄国没能达到夺取黑海两海峡的目的，1828年5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起初，俄军战绩不佳。梅特涅以为俄国胜利无望，就支持土耳其，同时主张大国调停。后来，俄军转入反攻，梅特涅害怕俄国独吞巴尔干半岛，就在大国中活动，策划建立反俄同盟，但未成功。1829年9月，俄土战争中土耳其战败，俄土签订了《亚得里亚那堡和约》，希腊终于获得了独立。

总之，19世纪20年代，是梅特涅狂妄得意的年代。当时，他周游德意志各邦，就好像帝王巡幸一样，受到隆重的礼遇。各邦君主、王公贵族前呼后拥。随便一句话，就被当作办事的依据，具有法律的效用。他的权力达到了高峰。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建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政权——七月王朝。这对欧洲的封建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梅特涅听到这一消息，深感自己已没有力量改变法国的局势，于是只得与俄国言归于好，商讨对策。沙皇认为，如果七月王朝遵守维也纳会议关于法国领土的决议，不威胁欧洲各君主国的利益，就不必干涉；同时，沙皇也不赞成梅特涅恢复欧洲大国协商的主张。梅特涅同意了沙皇的意见，并征得普鲁士的谅解。这是梅特涅对外政策的一个转变：即以俄、奥、普密切合作，代替了先前俄、英、法、奥、普五国对欧洲问题经常协商，来达到防止欧洲进一步爆发革命的目的。欧洲出现了英、法两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疏远俄、奥、普三个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形势，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俄、英、法、奥、普五个大国的均势状态已被打破。

法国七月革命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830年8月，比利时爆发了革命；9月至11月，德意志的萨克森等四个邦也爆发了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11月，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随后，意大利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开始高涨。总之，欧洲已处于激烈的动荡中。梅特涅忧心如焚，哀叹旧欧洲的末日即将来临。但是，他又疯狂叫嚷要与旧秩序共存亡，继续当“扑灭革命之火的消防队长。”1831年，他派兵镇压了意大利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帮助沙皇镇压了波兰起义；对比利时革命，他决定不

干涉，以缓和与英、法的紧张关系；伙同普鲁士镇压了德意志几个邦的革命。

梅特涅认为，俄、奥、普若能协调一致，就可以防止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33年9月，俄、奥两国君主和外交大臣以及普鲁士王太子聚会于明兴格列茨。会上决定：三国全力维护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国界，继续分别占领波兰领土，保障土耳其帝国现在版图不受侵犯；欧洲任何一国君主如受革命势力冲击请求援助时，都应给以支援；三方不定期举行秘密会议，商讨绞杀革命运动的步骤和方法。10月，又缔结了附有密约的《柏林协定》，规定：一旦发生内乱、外患，三国互相援助，以确保三个正统王朝的生存。这样，三皇联盟正式形成了。

在俄、奥、普加强合作的过程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国王的公主夏洛特成婚，俄、普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这时，梅特涅对俄、普的活动又起戒心，特别担心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增长。于是，梅特涅赞同英国关于保护土耳其而缔结了《伦敦条约》，土耳其被置于列强共同保护之下，俄国向土耳其的渗透受到了遏制。巴尔干地区的均势有所恢复，梅特涅乘机又和英、法两国接近。

从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均势外交的每一项外交活动，都是权宜之计，决非长期的政策。他反复无常，善于看风使舵，玩弄权术。他的主要策略是削弱法国，提防俄国，排斥英国，遏制普鲁士。他经常组织大国首脑会议，千方百计使其他国家互相抗衡，由他来掌握天平。他的一切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奥地利的利益，保证奥地利的生存。

19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欧洲各大国都想扑灭革命的火焰，但是，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不论是“神圣同盟”、“四国同盟”和“五国同盟”，都由于列强内部的利害冲突和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而决口、崩溃。梅特涅心劳日拙，已力不从心。

奥地利在德意志各邦中拥有最重要的地位。它的版图除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本土外，还延伸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波兰的加里西亚、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区。帝国境内除德意志人外，受压榨、奴役的有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悬崖及多瑙河基本上把奥地利围绕起来，再加上交通不发达，帝国的臣民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地的交往是很少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

梅特涅在奥地利独揽大权，进行残酷统治。为了严防革命思想的传入，奥地利在所有通往国外的隘口要道上都设立了两道警戒线，即关税官员警戒线和书报检查官员警戒线。任何一种外来书籍、报刊，如与梅特涅反动统治抵触，都被禁止入境。境内，几乎没有一种正式报刊，国民教育掌握在反动的天主教士手里，大学生只能学到一点落后、狭隘的知识。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和梅特涅推行的愚民政策，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梅特涅野蛮统治赖以

存在的基础。

农奴制在农村普遍存在。少数大银行家和大商人左右着经济命脉，天主教会势力渗透社会各阶层。贵族地主、商业巨头和天主教僧侣是支撑帝国的三根支柱。维也纳仅有几家手工工场，工人贫困不堪。农村和城市，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梅特涅政府推行民族不平等政策：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享有优先录用为政府官员的特权；强迫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德意志化；把德语定为帝国的统一语言；非德意志人的赋税重于德意志人，等等。奥地利是“各民族的牢狱”。

1821年，梅特涅担任帝国首相，全面管理国家。为了对付日益增长的民族独立运动。他采取狠毒的两手：一是用武力镇压民族骚动；二是利用民族斗争，掀起民族纠纷，煽动民族仇恨，而把各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在20年代，梅特涅就开始对匈牙利实行高压政策，以防止匈牙利人的独立。30年代，他残酷镇压了“青年意大利党”的起义。40年代，奥属波兰地区的中小贵族举行反对奥地利的起义，梅特涅鼓动加里西亚农民与起义者发生冲突，乘机扑灭这次起义。波希米亚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捷克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居住，于是梅特涅利用这两个民族间的矛盾，唆使德意志人去反对捷克人的自治运动。他多次到德意志各地视察，扬言一切革命的乌合之众都将匍匐在他的脚下。1832年，他敦促邦联议会作出决定，如德意志某邦君主对臣民许诺颁布宪法，或臣民向君主要求宪法改革，邦联都要立即派军队进行干涉。他声称不管欧洲发生什么变革，决不让德意志出现一部宪法，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就难怪弗兰茨一世说，如果没有这位大臣的尽忠，自己会难以安居其位。梅特涅则回答说，如果没有皇上的知遇之恩和始终支持，自己也无法施展才能。

1835年3月，弗兰茨一世病逝。根据遗诏，由梅特涅辅佐斐迪南大公继承帝位，称斐迪南一世。新皇帝患有癫痫，被人称为白痴，失去了处理国事的能力。这样，梅特涅进一步操纵了大权。但由于欧洲和奥地利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权势已日益衰落；他本人却日益爱好虚荣，讲起话来喋喋不休，令人厌烦。

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它与法国、意大利的新兴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冲破梅特涅在中欧、东欧筑起的封建壁垒，为英国工业产品提供销售市场。这时，德意志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开始了工业革命。萨克森兴建了45个大型纺织厂，普鲁士有蒸汽机1000多台，莱茵地区的煤矿工业，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业成为德意志有影响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1834年1月1日，有18个邦参加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关税同盟使德意志民族结成一个经济实体，它符合德意志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梅特涅却认为，关税同盟是对德意志邦联的严重挑战。他不让奥地利参加关税同盟，这使奥地利在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中越来越不得力。1840年登基的普王威